

012 文学纪念碑



#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阿·谢·多利宁 编 翁文达 译 耿海英 校

Д о с т о е в с к и й

---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阿·谢·多利宁 编 翁文达 译 耿海英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A. C. Долинин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本书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4 年  
版译出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多利宁 编;翁文达 译;  
耿海英 校.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

Ⅰ: ①同… \* ①藏… ②… ③… \* Ⅲ: ①陀思妥耶夫斯  
基, F. M. (1811~1881) —生平事迹 Ⅳ: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3347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47 字数:640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8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

1872年,瓦·格·别洛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幅著名的画像。作家的妻子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画像非常满意:画家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静静地坐着,两手的手指交叉,抱住膝盖,在那里“自我观察”<sup>①</sup>,但画像还是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活力的印象。高高的前额,紧蹙的眉毛,表现着精神的紧张,脸上的整个神情显示着连续不断的思想活动和感情变化。

是的,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别洛夫出色地表现了作家全身心沉浸在创作、沉思、探索之中。

一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论述说,画家应当“更多地表现思想过程”。“比如,肖像画家要给对象画像,他让对象坐下来,仔细观察,作事先准备。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从实际作画中知道,人并不是始终都像他自

<sup>①</sup> 也可译作“观察自我”,即作内心的省察,“内省”的意思。

己,所以画家在寻找‘他的面貌的主要思想’,寻找对象最酷似他自己的那瞬间。肖像画家的才能就是善于捕捉和抓住这一瞬间。”<sup>①</sup>人“最酷似他自己”的时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意思”,他的观念、观点、目的、性格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写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目的和希望是“在我死去之前,尽可能充分地发表意见”。<sup>②</sup>

充分发表意见——这就是目的和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对事的态度——这才是心中最珍贵的理想。别洛夫的功绩就在于他抓住了“创作的瞬间”,他觉察到了作家的沉思中、内心活动中潜藏着天才的隐秘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总是在作家要创作一部能发表自己意见的作品之前就存在了。

生活的意义在于创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就有的观念。回想起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他在《死屋手记》的结尾处写道:“我等待着,我呼唤自由快些到来,我想在新的斗争中再考验考验自己。自由并不是因为被剥夺过自由而歇一歇,因为受过深重的苦难和考验而犒劳一下自己,也不是为了过平平安安的生活。自由是为了行动,为了创作,为了把心中蕴蓄的思想和观感具体表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来有一副社会性的、富有公民感的积极性格。时代总是很有威力地侵入他的作品。仅仅说他非常关心人民和国家的生活还不够,这是他的血肉相连的事业,他的生命。他常常犯错误,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站错位置,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冷淡的、漠不关心的袖手旁观者。他的成长,他的发展,他的创作活动的历史是和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人民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充满了什么样的事件,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激战、政治激战和思想激战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啊!他是在四十年代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在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受审判,和他们一起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等候枪决;服了四年苦役,当了五年兵。他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至1861年的革命形势,反动派猖獗的年头,七十年代新的革命热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页78。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卷,页175。



情的高涨,新的镇压和反动派横行霸道的浪潮。社会基础的巨大变革,俄国——无论是农奴制的俄国还是稍加改革后的俄国——的劳动群众的苦难,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巩固,社会矛盾、思想矛盾和精神矛盾的全面尖锐化——这是当时国内生活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为人和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是作者们的最深刻的肖像,书中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现象的评价,他们的气质……然而即使艺术家本人的生活,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艺术家的人性的特点,对于后代人也是饶有兴味的。须知在代表一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人物当中,俄国作家乃是时代和环境的鲜明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的个性是十九世纪俄国生活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世界性的,然而重要的是恰恰在俄国现实的激流旋涡中出现这样的人物!文学回忆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动风貌,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回忆录作者们所提到和所描述的他的个性的“主要意思”,不可能不使我们激动。

苏联的文艺理论力图研究充满了痛苦的矛盾和复杂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丝毫不予以简单化,也不夸张,清楚地看到,清醒地评价他的长处和短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摘革命,又不能容忍现存制度的不公正;他号召顺从,却又愤怒谴责践踏人类尊严的人;他向神祈求,却又屡屡描写生活如何在摧毁宗教观点。

避开这些矛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作片面的、简单化的、空泛的描述,那就意味着拒绝了解十九世纪俄国所产生的一种就其能力和多才多艺、就其痛苦而又复杂的表现方式而言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要知道,直到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继续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貌被人从极不相同的观点来观察,人们对这个面貌的特点作出极不相同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谨慎、稳健的亚诺夫斯基医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对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亚·米柳科夫写到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是那个斯拉夫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尼·斯特拉霍夫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每个俄罗斯人一样”,厌恶“各种不顺从的思想”,如此等等。回忆录的作者们引用自己的观察和回忆,引用“事实”;然而,一些个别的“事实”还构不成全部真实。真实是从分析和对比所有的事实中,从考虑所有的矛盾中,从概括全部资料中形成的。对陀思

妥耶夫斯基尤其是这样,他的活动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的作品常常引起他那一代人的剧烈冲突和互相抵触的评价。

回忆录就是回忆录;不能要求回忆录写得详尽无遗:回忆录作者只提供面貌的特征。认识一个人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人的看法。一部分现象似乎不大重要,被人忘掉,另外一些现象被人主观地加以解释,好些事实在时间上往往颠倒。回忆录总是需要考订,注释。

常有这样的情况:回忆录作者所回忆的那个人太伟大了,作者难以理解他。上文提及的斯·德·亚诺夫斯基就是因为这缘故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他对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熟悉的,可他留下的却是一幅满怀同情然而平面的肖像。作家的兄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详尽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可是他却不能或多或少地深刻理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精神世界。阿·雅·帕纳耶娃留下了一幅幅素描,但是摆脱不掉某些傲慢——毫无道理的傲慢。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一个神经质的、没有自信心的、爱面子而又怪可怜的青年人,没有反映出那位勇敢地发现生活中的新现象的大艺术家的特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写作《穷人》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个大艺术家了。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还是他的生平经历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更生动、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和性格,有时候还能阐明他的创作。这些回忆录能比较具体地提供他一生活中的要点——他同祖国的联系,和俄国生活的联系,与同时代人的联系,——不了解这些要点就无从了解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就遇到人间的“出奇的”贫穷,人的屈辱和没有防卫能力。他的父亲在玛丽雅医院执医业,这个单位是“为穷人”的机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厢房里。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曾为贵族服务过,但是没有积攒起什么财富,正如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①</sup>所回忆的那样,他经常对儿子们说,他们“应当有决心自己去闯出一条路来,否则他死了以后他们将沦为乞丐”。一家人经常害怕陷入贫穷的罗网,贫穷的种种形象包围着寄寓于医院厢房里的医生家庭,这户人家暂时还可算个小康人家。

<sup>①</sup> 作家的弟弟,见本书页50的题解。

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千方百计要摆脱这种威胁,保障孩子们的未来,遂于1831年在图拉省扎拉依斯克附近买下一个小小的田庄。这块领地和幸福的回忆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那里过夏天,摆脱城市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息(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不过后来又同最强烈地震撼青年时代的作家的那件事情联系在一起。1839年,田庄的农奴把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孤儿,没有钱,在工程专科总校的纪律严格、吹毛求疵、刚愎自用的环境里,花了几年时间去学他不喜欢的专业,搞他深以为苦的科学。在专科学校里,就像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所回忆的那样,“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苛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为一点最无辜的过失,如领子或纽扣未扣上,就被罚关禁闭,或者背上背囊,手持枪械,在门口罚站几小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非正义现象,军队里<sup>①</sup>盛行的盗窃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升官发财思想使他愤怒。在专科学校当过值班军官的亚·伊·萨维里耶夫回忆道:“公务中的许多事情……使他愤慨。他不能眼看着农奴囚犯戴着脚镣手铐在他的管区里劳动,也不能看着在喀琅施塔特担任警卫的部队中进行的惩罚而无动于衷。”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烈地感受到长期的经济拮据,他觉得,在比较富裕的同学的眼里,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信向父亲要钱:“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得完全迁就眼前我所交往的这伙人的规矩。为什么要拿自己做例外呢?这种例外有时候常会使人遭到极大的不愉快。”<sup>②</sup>

彼·彼·谢苗诺夫-天斯基说得对,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强调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他要让人家知道,他“不比别人差”。他充满了神经质的、紧张的忧虑,怕有人认为他不够资格待在军官阶层。“……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地,住同样的麻布帐篷[……],没有自备的茶,也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

① 工程专科学校是一所军事性质的专科学校,详后。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页52。



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我凑合着过日子。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箱子。”

未来的作家是高度敏感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使自己避免遭受可能有的嘲笑或者仅仅白眼相待,人们公正地看到,这种心理状态,不仅有个人的病态,天生的腼腆,而且还有一个在小市民阶层里长大,后来落入另一个环境的人竭力想要战胜社会的不信任的愿望。<sup>①</sup>

真正的穷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后来他父亲死了,他从总工程专科学校毕业,决定退役离职之后才认识到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衷心喜爱文学。在工程学校学习,后来在绘图局供职,使他苦恼,经常牢骚满腹。放弃差使,退职,在文学界还不曾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职业,没有钱,这意味着他要表现出一种决心,准备去迎接没有着落、没有保障的生活,遇到种种巨大的困难。况且他的亲属们,虽然稍稍支持过他,却也并不赞成这样“轻率的”步骤。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抉择。他常常身无分文,从一间“向住户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处;他借债度日,造成自己陷入依赖高利贷者的局面,受重利盘剥;一旦有了钱,他又花钱如流水,快得惊人。他饱尝了彼得堡的穷苦的公务员、小市民、小官吏的屈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住的是顶楼和屋角落,后来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拉斯柯尔尼科夫<sup>②</sup>说:“低矮的天花板和狭窄的房间使心灵和思想憋得慌。”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是作者的亲身体验。

“我没有一文钱去买衣服[……]。人家当真会拉我进监狱(这是明摆着的)。极其喜剧性的情势[……]。主要的是我将会没有衣服穿。赫列斯特科夫<sup>③</sup>只同意以体面的样子去蹲监狱。我如果连裤子都没有,哪来这体面的样子呢?……”他在给兄弟的信中痛苦地戏谑道。“我为吃饭而写作”,“我如果不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也许要跳涅瓦河了。有什么办法呢?”<sup>④</sup>

然而,即使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也没有产生过去担任公职、去做官或者

① 见弗·基尔波金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60年,页17—22。

② 《罪与罚》中的人物。

③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

④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73、74、75、79。

当军官以度日的想法。里森坎普夫医生的回忆录中就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责,认为他不会精打细算,缺乏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轻信,——这些品质确实是他生来就有的,但是学究气很重而资质中庸的里森坎普夫毕竟不懂得主要的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没有保障、没有着落的生活为代价,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对于创作,对于作为作家的他能和他所需要、他所感兴趣的那个世界进行自由交往,保持独立是必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这个世界的社会冲突的尖锐,而且“连同它的全体居民,强者和弱者,连同它的全部住所,穷人的栖身之所或金碧辉煌的宫殿”<sup>①</sup>也一起看到。他认清了身居金碧辉煌的宫殿的人们的邪恶力量,金钱的压迫力量,为金钱服务的政权的压迫力量。后来服苦役时他遇到不计其数的更加可怕的苦难和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但是他不仅感觉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活的压抑沉重,还感觉到诚恳的普通人的精神力量,这些人即使在首都贫民窟的黑暗角落里,在“死屋”的四壁之外,都保持着理智、同情心和对人的信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作家的书信,对他的那些描写“穷人”、“小人物”的悲剧性作品,乃是一种独特的注释。

《穷人》问世后,别林斯基惊叹道:“荣誉和声望归于年轻诗人,他的诗神喜爱住顶楼和地下室的人。”<sup>②</sup>然而作家的诗神也善于憎恨:她憎恨庸俗的小人、守财奴、追求升官发财的人、冷酷的人、吝啬者及自私自利的家伙。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了解这个世界,用众多的形象体现这个世界,一面对俄国社会想要了解当时现实真相的迫切要求作出回答。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表明,文学很早就进入未来作家的精神生活,迅速占据了整个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火鸟、阿辽沙·波波维奇的俄国民间故事开始,从孩子能看懂的圣经故事转向卡拉姆津、杰尔查文、扎果斯金、拉谢奇尼科夫,然后又转向普希金和果戈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起,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怎样从读学校里教学大纲规定的正规书籍转到读当代作品,这些当代作品尚未停滞在学校的教学史上,还没有成为虽然壮丽但却呆板的形象。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8卷,页156。

②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第9卷,页554。

“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像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就是照我们父母的看法,他的威望也还是比较小的,以致屡次引起两个哥哥(即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方面的强烈抗议。”

普希金的死讯传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正好是他们的母亲刚死不久,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哥哥们几乎要发疯了。费奥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谈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从童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普希金成了作家的同路人。

正如斯特拉霍夫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受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教育,还经常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

亚诺夫斯基医生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和果戈理“看得比所有的其他作家都高,谈起这两位作家,他常常凭记忆整章整章地引用他们的作品,或者背出一个个完整的场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果戈理的作品从来不会觉得疲倦,并且往往一边大声朗读,一边作解释,发议论,对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如此。他看《死魂灵》几乎每次都要掩卷赞叹:‘对于全体俄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作家兄弟,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导师呀!这才是一本真正的书!老兄,您每天看它一点,哪怕只看一章,可是要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马尼罗夫的甜言蜜语,又有罗士特莱夫的厚颜无耻,还有梭巴凯维奇的粗野笨拙,又有种种愚蠢与恶习。’”

陀思妥耶夫斯基屡次讲到果戈理对人们的性格和相互关系的奥秘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也赞赏果戈理的揭露卑鄙和庸俗的有力,能从小官员丢失一件外套而创作出“可怕的悲剧”<sup>①</sup>,激起对“小人物”的爱。稍过一些时候作家会说,果戈理的作品“以最深刻的、异常困难的问题使人心里难受,在俄国人的头脑里激起最不平静的想法”。<sup>②</sup>

回想起精神形成的年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怀疑和否定的恶魔,写到果戈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8卷,页50。

② 同上,第11卷,页250。

理和莱蒙托夫,他们伴随着当时年轻人的精神探索。<sup>①</sup>

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教人们去了解日常悲剧的意义,这种悲剧在日常生活中窥伺着人们,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平淡无奇,不易为人察觉;他们又教人们不要容忍身边的丑恶与畸形的事物。他们对培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公民和作家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专心致志地观察国内的生活,不是研究它的堂皇的一面,而是研究它的日常的风貌,他逐渐掌握本国文学的经验。有时候,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往往片面地、不正确地解释前辈们的遗产,偏执地特别注意遗产中提出的要人们“顺从”、“不要高傲”的呼吁。不过作家创作中的一切精华却发展和丰富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进步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熟人,他的工程专科学校的同学们详细讲到未来的作家也非常关心外国文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九岁的时候看过舞台上演出的席勒的《强盗》,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对席勒的高尚的、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爱得入迷,席勒对他的精神上的自我觉悟起过这样的作用。“我把席勒的作品背熟,用它来说话,老是挂在嘴上;我以为,在我生命的这样一个时期,命运让我认识了伟大的诗人,这是命运在我的一生中所做的凑巧的事情。”<sup>②</sup>这几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工程专科学校里的艰难年头写的。诗人的仁爱的豪情,奔放的热情,他的思考和感觉的方法,给予少年人以强烈、有益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席勒的精神比较合俄国人的心意,而不大对法国文学教授的胃口<sup>③</sup>,他的话是对的。对于官方的教授们来说,席勒是一个研究和诠释的对象;对于年轻的探求真理的人们来说,席勒是促进思想和精神发展的重要因素,解放思想的本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专注的兴趣阅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霍夫曼和狄更斯的作品。

据里森坎普夫回忆,法国作家当中,“巴尔扎克、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特别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爱”。作家自己的证词也肯定了这一点:“巴尔扎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8卷,页50。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57。

③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页309。

克伟大！他的那些典型是宇宙中全部智慧的产物！”——他在1838年就写道。<sup>①</sup>得知乔治·桑去世，他在1867年的《作家日记》中回忆道：“这位诗人当时得到我的多少欢呼，多少景仰；她又给过我多少欢乐，多少幸福！我大胆写上这几句话，因为句句是真实的。她完全是我们的（也就是我国的）一个同时代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我以为，小说中典型和理想的这种童贞式的、极其高尚的纯洁，叙事语调的严谨的朴实之美，当时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同样也使还是青年的我感到震惊……”<sup>②</sup>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雨果的创作中发现“失足者重新做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亲切的。

伟大的西方作家增强了他的求解放的愿望，坚定了他对人类的信心，帮助他更好、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社会，鼓舞他去为反对社会的不公平而斗争。

西方作家的书籍传入俄国，也带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以及底层群众的民主运动的经验。他们提供了以清醒的艺术家的敏锐目光看待生活的榜样，生活中沸腾着复杂的社会斗争，压迫、剥削和镇压的势力盛行。工程专科学校既不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知识，又不能给他伟大的道德思想。紧张的工作的年代要求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感的作家和公民。有些人认为，罕见的直觉帮助他了解人，判断人物的特殊性，深刻理解人的个性中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当然，艺术家的天才和直觉是有联系的，毋庸争辩，“天性”是一桩伟大的事实；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能，天才大师的“天性”是和多方面地广泛掌握以前的文化艺术修养结合在一起的，和他的前辈们——伟大作家们的精神方面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

普希金的《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诗篇之一。去世前不久，作家在莫斯科的纪念普希金的集会上朗诵了这首诗；把作家的使命理解为布道的观点很对他的心思：

你必须走遍天涯海角，  
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点燃……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47。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1卷，页308、311。



这两句诗他念得特别激动,热情洋溢。

普希金、果戈理、席勒与乔治·桑增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为诗人搞创作的意义在于为人民的坚定信念。“我[……]始终相信很有美感地表现出来的仁爱给人的强大印象,”他写道,“印象逐渐积累,发展,冲破心的外壳,钻入心中,培育人成长。语言,语言是伟大的事业!”<sup>①</sup>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来说,创作是经常的内心需要,是人生的使命,最后,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无论如何都应当去完成的,而且要毫不怜惜自己地、很好地去完成。

“您不会相信,我忙到什么程度,日以兼夜,像服苦役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束时写道。“总之,我神经质地、痛苦而又忧心忡忡地工作着。我加紧工作,我甚至感觉到肉体上的痛楚[……]。您相信吗,尽管已经写了三年,写得劳累至极,我却还要写另外的文章,还出废品,还要重写,重写。仅仅在灵感来了的地方是一挥而就的,其余的地方全是非常艰苦的活儿。”<sup>②</sup>

斯特拉霍夫回忆说:“有一次我听他说,为了治疗他的癫痫,医生们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完全停止写作。这一点,即使他本人能下决心过这样的生活,过一种不必执行他认为自己的使命的生活,自然也还是做不到的。”

别林斯基很透彻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果戈理派的许多作家走得更远。作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贫富对立、逆来顺受与有权有势的对立上,不是把这种矛盾当作道德问题,而是当作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帕·瓦·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讲述别林斯基的话,称《穷人》是俄国文学中“社会小说”的滥觞。

帕·瓦·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引述了别林斯基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穷人》的主人公们尽管处于生活的底层,却没有失去崇高的人性,他们互相同情,患难相助,谴责“有钱有势者”的非正义行为,但他们是消极的,并且现实本身也正在粉碎抽象的博爱。“事情很简单:有些心地善良的怪人认为,热爱整个世界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是非凡的快事。他们丝毫不能懂得,当生活的车轮挟带着种种规章制度朝他们滚来时,会无声无息地碾碎他们的躯体与四肢百骸。这就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13卷,页191。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1959年,第4卷,页198—199。

完了，——然而那是多妙的戏剧，多精彩的典型！”

“您自己是否明白，[……]您写了什么！”别林斯基第一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时就高声叫道，“您向我们指出的那整个可怕的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场景有着客观的内容，作者本人对它也未必完全清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倾向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渴望解放的热情鼓舞着他。难怪他写道，“使不公正地受到环境的压迫，受到几个世纪的停滞的制约和社会偏见的压制而毁灭了的人”得到恢复，是“十九世纪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也许还是历史的必然性”。<sup>①</sup>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还摆着为被毁灭的人恢复原状而进行探索的漫长又痛苦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5年与涅克拉索夫及别林斯基相识；1846年1月，在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文集》中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1849年4月22日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被捕。这四年，在作家的遭遇中，在他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上，都充满了剧烈的变化。有时是受赞扬的快乐，有时是受指摘的痛苦；有时是别林斯基和他一派的人向他表示最真挚的好感，有时又对他的新作表示强烈的不满。在有些人（伊·伊·帕纳耶夫、阿·雅·帕纳耶娃）的回忆录中，人事关系的变化被说成是由于狭隘的私人的原因：格里戈罗维奇和帕纳耶夫太喜欢挖苦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太傲慢；屠格涅夫过于摆老爷架子；如此等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一派人的分歧的实质完全不是小事情，这是当时俄国文学的发展在现实主义、民族性及艺术的社会功能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和别林斯基一派的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寻求与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接触。他开始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把青年作家对待革命的态度设想得各不相同。亚诺夫斯基医生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个“无比地善良，又善于洞察人心”的人，根本不可能是个“阴谋家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同情社会主义。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然而，作为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到有人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施加暴力，他的愤懑乃至憎恨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只有在这样激情勃发的时刻，陀思妥

<sup>①</sup>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526。

耶夫斯基才会扛着红旗走上广场。”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抗议只能归结为一时的热情冲动,此外就别无其他了。有人以为不是这样。亚·彼·米柳科夫告诉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对书报检查制度,对当局的滥用职权,都发表过意见,而且他“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表意见尖锐而又激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集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念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篇热情洋溢的革命宣言。他准备参加暴露文学的出版工作,闲谈时严厉谴责农奴制,对任何企图把农奴制理想化的尝试都感到愤怒(后来,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试图证明地主对待农奴的态度是人道的伊·谢·阿克萨科夫进行论战,不是偶然的)。<sup>①</sup>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者之间当时就存在着分歧。四十年代的革命小组纷纷研究和宣传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卡贝<sup>②</sup>及其他人的思想。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特别的态度。他熟悉傅立叶、圣西门的著作,赞成消灭人剥削人的思想,人人平等的思想,但是他不接受组织未来社会的空想计划。米柳科夫写道:“伊加利亚公社<sup>③</sup>或法朗吉斯特<sup>④</sup>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当然,我们那些顽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竭力想要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即在人的集体关系上组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优越性。同时他们又不肯舍弃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规章制度,试图抽象地预先制订出未来社会的整个生活制度以及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节。这自然证明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证明他们有力。科学社会主义依靠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否定这样的规章制度。历史的经验使我们预见到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也不规定这个社会体制的细节。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的正义将占优势,摆脱经济、政治和精神枷锁的人将做整个生活的主人,他自己能够恰当地制订生活和行动的

<sup>①</sup> 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日报》断言:“……总起来说,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人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篇文章表示愤慨:“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农奴制度是合乎天意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第13卷,页154)——作者注

<sup>②</sup> 卡贝(1788—1856),法国作家,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sup>③</sup> 伊加利亚公社即卡贝在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游记》中所描写的地方。

<sup>④</sup>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想的生产单位叫法朗吉,这样的单位中的住房叫法朗吉斯特。

规约。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能够历史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未来社会的人放在规定好细则的狭窄框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意识上是表示反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别林斯基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争论过上帝和宗教。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记得的那样,别林斯基是直接从无神论开始和他争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个信仰宗教的人;但是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一辈子都有意无意地为上帝的存在问题而苦恼。<sup>①</sup>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别林斯基的热情洋溢的论证的冲击下,有的地方受了影响,他为疑惑所苦恼。他捍卫基督,争论着灵魂的不死。《两重人格》中,尤其是《女房东》中神秘离奇的基调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接受别林斯基的思想转到与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神秘主义倾向。

正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写的,“由于对文学和文学发展的趋向的看法”,他与别林斯基的分歧有重大意义。<sup>②</sup> 别林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以神秘离奇的精神来解释民族性。他主张文学应有高度的思想性,能自觉地对待现实,给民众带来真理之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正如他本人当时所写的,艺术的这些职能,他称之为“辅助性”的职能,是沉重的负担。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之间,后来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之间的分歧,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推测这些矛盾如果发展下去将会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家的创作发展被暴力之手几乎打断了整整十年。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和去流放的回忆录自然是不多的。然而彼·马尔季扬诺夫、亚·弗兰格尔及其他人的回忆录稍稍说明了作家在体力和精神上忍受并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与痛苦。这些回忆录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苦役和流放中保持了坚毅的性格,人格的力量,没有失却自信心。最辉煌的证据是《死屋手记》,——这是一份漫游俄国苦役犯地狱的可怕的大事记。最沉重的考

<sup>①</sup>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63。

<sup>②</sup> 恩·弗·别利奇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诉讼案中》,莫斯科,1936年,页85。